



金大定二十二年(1182年),宁海州建制伊始,这片古老的土地便孕育了无数铮铮铁骨的仁人志士。尽管他们身份各异,却共同谱写了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浩然正气。接下来,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三位宁海先贤震古烁今的人生篇章,去感受那份穿越历史长河、激荡人心的精神力量。

铁骨对丹心 大明死牢中的生死知己

大明嘉靖年间,权相严嵩一手遮天,忠良之士屡遭迫害。著名诤臣杨继盛因劾劾严嵩而被陷害入狱。彼时的刑部司狱宋绣,以微末之躯守护被打入死牢的杨继盛,成就了一段载入史册的“大明死牢中生死知己”的故事。

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,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斋戒三日毅然呈上《请诛贼臣疏》,历数严嵩“五奸十大罪”。这一纸奏疏触怒了嘉靖皇帝与严嵩,杨继盛随即被廷杖一百,打得皮开肉绽后收监入狱。

宋绣,山东宁海州史家疃(现属乳山市)人,时任刑部司狱(司狱司主官,从九品,主管中央刑部监狱,不审案,只管狱政)。他知道杨继盛是朝内著名的诤臣,曾因参奏备受皇帝宠爱的大将军、咸宁侯仇鸾而被下狱,后贬狄道(现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)典史。仇鸾罪行暴露后,杨继盛才被平反,授诸城知县。严嵩为拉拢杨继盛为己用,“欲骤然让其显贵”,一年内四升其职,直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。岂知“继盛憎恶严嵩甚于仇鸾”,抵任刚过一月,即上书条陈严嵩十大罪而被下狱。宋绣素知严嵩奸恶,而对于杨继盛这位素未谋面的大忠臣却崇拜之至,他决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,尽最大努力加以保护和关照。

宋绣了解到,刑部侍郎王学益等严嵩党羽欲坐杨继盛诈传亲王令之罪,律当绞,然而皇帝不欲诛杀杨继盛,令监禁死牢中。于是宋绣便有了保护杨继盛的底气。

当时,严党胡植、鄢懋卿等一心想将杨继盛死于狱中,狱中的提牢官刘横也受命故意刁难杨继盛。每当这些严党借故来动手脚时,宋绣总是挺身而出,帮助杨继盛化解危机。后来严嵩的爪牙又对宋绣软硬兼施、威逼利诱,想让杨继盛在狱中“暴毙”,都被宋绣严词拒绝。平日里,他更是处处设防,多次以“严查违禁物品”为由,不动声色地粉碎了严党爪牙企图暗害杨继盛的各种阴谋。

正是有了宋绣在暗处的层层维护,遍体鳞伤的杨继盛才得以在残酷的诏狱中撑过最艰难的岁月。

杨继盛在狱中受尽酷刑,伤痛难忍。宋绣托人买来珍贵的蜘蛛胆为他镇痛,杨继盛却推辞道:“椒山自有胆,何蜘蛛为!”深夜剧痛袭来,杨继盛打碎瓷碗,亲手割去身上腐坏的血肉,连袂卒看了都吓得手抖灯落,他却意气自如。目睹此景,宋绣对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愈发敬佩。

在这暗无天日的囹圄之中,杨继盛并未沉沦于绝望。他在幽暗潮湿的墙壁上刻下了那副震古烁今的对联——“铁肩担道义,辣手著文章”,以此明志。除了这副对联,他也曾望着满地阴湿的苔痕,写下“西风满地苍苔红,尽是泪因冤血泪”的悲愤诗句。当得知好友宋绣即将致仕归乡的消息时,杨继盛心中涌出的不是对自己身陷绝境的哀怨,而是对这位仗义挚友的深深感激与不舍。

时光流转,宋绣即将告老还乡。临行前,杨继盛满怀感慨,挥毫赠诗一首:“共说山中好甲子,百年林下见高人。醒初幻枕俱为梦,归去此身方属君。昏夜法星辞帝座,秋风行色动乾坤。西台多少含冤者,一听离歌泪满巾。”整首诗既是在夸朋友高风亮节,也是在感叹自己身陷囹圄、壮志未酬的悲凉,字字泣血,句句含情。诗里的“法星”是杨继盛对宋绣极高的赞誉,把他比作掌管刑狱的公正之星。

宋绣归乡后,杨继盛最终在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惨遭杀害。临刑之际,他留下了最后的绝命诗:“浩气还太虚,丹心照千古。生平未报恩,留作忠魂补。”年仅40岁的杨继盛含冤而死,直到明穆宗即位,他的冤案才得以昭雪,被迫赠太常少卿,谥号“忠愍”。而宋绣那份在黑暗年代里坚守正义、仗义守护忠臣的风骨,也随着那首离歌,永远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
蓬山风骨 贺广令的遗民绝唱

在明清易代那段天崩地裂的岁月里,山东宁海州南门外走出了一位名叫贺广令的奇男子。他字子莲,号蓬山,弱冠之年便考中崇祯己卯科副贡,才情斐然。他本该在仕途上大展宏图,然而,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——明朝的覆灭与清朝的崛起,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转变。

清廷初立,求贤若渴,朝廷急征贺广令入朝为官。面对新朝的橄榄枝,贺广令没有丝毫动摇,他以“教授家乡诸生”为由,极力推脱。不久,朝廷再次加急征召,他更是决绝地选择了逃避。为了彻底断绝官府的念想,这位曾经的翩翩公子脱下儒衫,换上粗布农装,从此“黄冠入山林”,隐姓埋名,专心带弟子们读书治学。

每逢新春佳节,当邻里乡亲沉浸在节日的欢声笑语中时,贺广令却紧闭门户,或披头散发长吁短叹,或独自走进祠堂,对着冰冷的牌位跪拜泣诉,甚至整日坐在角落里不发一言。这种怪异的举动持续了整整50年,乡邻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,家中的子弟也不敢贸然询问。直到晚年病重,弥留之际,面对子弟们的追问,贺广令才流着泪道出了深藏心底的痛楚:“我先人忠节,为守城殉难太惨烈!”原来,崇祯癸未年(1643年)二月,清

军攻破宁海州城,贺广令的父亲贺绳前(举人),兄长贺永令(举人)、贺元令(庠生)全部在守城中壮烈殉国。他的姐夫官若岨全家遇难,五服之内不存一丁。那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,全城包括知州、州同、宁海卫指挥、指挥金事在内的官民遇难者达3000余人。贺广令于战火废墟中收埋了亲友的骨骸,直到后来清朝褒扬崇祯年间的死难者,才得以将亡者的牌位供入先圣先贤祠。这份血海深仇,成了他终生不仕清朝的根本原因。

贺广令的铮铮铁骨,深受古籍中伯夷叔齐“不食周粟”精神的影响。他20岁随父进京,师从宋澄岚、左萝石两先生。恩师左萝石先生教导他,古文中关于法的记载,最全莫过于《史记》,其中的《伯夷列传》等篇章最为动人。张霁涛所赞的那样:“蓬山,高节古义,有亦世不可没之光也欤!”

除了高尚的气节,贺广令在琴棋书画与医术上亦造诣颇深。他善诗,虽遗稿已失,但《蓬山琴谱》一卷流传至今。贺氏家族珍藏的一架古琴,背刻“松涛”二字,便是他的旧物。他的书法笔锋凛凛,透着一股不屈的生气。晚年,他更精通岐黄之术,著有《蓬山脉诀》与《痘科》各一卷,惠泽济世。

这位在乱世中坚守气节的遗民,死后被崇祀于宁海州忠孝祠。贺广令用他的一生,诠释了什么是“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,他的风骨,如同那琴背上的“松涛”二字,穿越数百年的时光,依然激荡人心。

血染金鸡山 张桎抗英守土壮烈捐躯

清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,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。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,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东南沿海。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抗争,涌现出了无数舍生取义的英雄儿女,来自山东宁海州东沙子村(今属烟台高新区)的武生张桎,便是其中一位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壮烈士。

张桎时任浙江平阳营都司,护理金华管协镇。他生性刚烈,武艺高强,更有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。当英军的魔爪伸向浙江镇海时,钦差大臣、两江总督裕禄率众将士祭神立誓,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誓言:“断不敢以退守为辞,离镇海半步;不敢以保全民命为辞,受夷人片纸。”张桎身在其中,热血沸腾,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
彼时,张桎随总兵谢朝恩驻守镇海金鸡山,而他的弟弟张果尚在平阳署内。大战在即,张桎深知此去凶多吉少,便修书一封寄与弟弟。信中未谈家常琐事,唯有慷慨激昂的国家民族大义,以此作为与手足的诀别:“近日海疆不靖,英夷寇边,战火已迫眉睫。兄守金鸡山,乃镇海之咽喉,若此关不保,则浙江腹地危矣。兄与诸将士同仇敌愾,早已抱定必死之心,誓与阵地共存亡。英夷虽悍,然我中华男儿,岂是贪生怕死之輩?兄今日提笔,非为诀别,实为明志。若兄幸而生还,此信当焚;若兄不幸捐躯,此信即为遗言。弟当知,兄之死,非为一人一家,实为天下苍生,为祖宗基业。”

同年九月,英国侵略军头目璞鼎查率勇率50艘兵舰、4000名士兵,在攻陷厦门、鼓浪屿后,率兵北上,直逼浙江舟山海域。尽管两江总督裕禄积极备战,并痛陈利害请求增兵,但昏庸的道光皇帝却听信妄言,斥责说:“英人赴浙,出自夙闻,不足为据。”“勿听妄言,酌量撤兵”。在朝廷指令与前线危局的夹缝中,裕禄与将士们只能背水一战。

英军来势汹汹,临时将定海镇总兵葛云飞、处州镇总兵郑国鸿、寿春镇总兵王锡朋调来,面对英夷的坚炮利刃,浴血奋战。葛云飞手刃英兵,奋起削去英军头目安突德的脑袋,但终因力竭悬殊,壮烈殉国;王锡朋、郑国鸿也先后战死。定海失守,战火随即烧向了镇海。

金鸡山,是镇海的一道重要防线。当英军逼近金鸡山时,守将谢朝恩与张桎早已率领将士们严阵以待。战斗打响后,将士们同仇敌愾,凭借地形优势,手握长矛大刀,手持洋枪洋炮的英军展开了殊死搏斗。金鸡山上,刀枪并举,杀声震天,鲜血染红了山石,几个回合就击杀英兵上百人,阵地一度固若金汤。

然而,就在鏖战正酣之时,变故陡生。负责防守招宝山的浙江提督余步云,竟贪生怕死,临阵脱逃,在阵地上竖起白旗,放弃阵地向宁波溃逃。这一无耻行径瞬间动摇了军心,导致部分兵士溃散,防线崩溃。

面对危局,张桎没有丝毫退缩。他怒发冲冠,身先士卒,在混战与硝烟中高声呼喝,指挥残部继续抗击。他手中的大刀染满了敌人的鲜血,却始终未退半步。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,总兵谢朝恩也在激战中壮烈殉国。张桎孤身立于阵前,面对蜂拥而上的英军,伴随着最后一声嘶吼,冲向敌群,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,践行了他“不离镇海半步”的誓言。

随着金鸡山与招宝山的失守,总督裕禄见大势已去,不愿受辱于敌,亦投池殉国。张桎虽死,其浩气长存。清廷感念其忠烈,追授他为武德骑尉。其妻于氏被封为宜人,其子张瑞偕袭云骑尉。

在那段屈辱与抗争交织的岁月里,张桎以死将之躯,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。他的英勇事迹提醒着后人: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面前,中华儿女从未缺乏过杀身报国的铮铮铁骨。

包拯 宗泽 两宋名臣宦迹古登州

□蔡玉臻

包拯、宗泽,皆为两宋重量级名臣,名垂青史,家喻户晓。在登州蓬莱乡土文脉中,二人尤被乡人感念和铭记。包拯以清廉刚正为千古循吏标杆,世尊包青天;宗泽以文武兼备、忠勇报国立身,是与岳飞齐名的抗金民族英雄,德望声望深入人心。

据清光绪七年《增修登州府志》职官、名宦二卷及《宋史》正史可考:宋仁宗嘉祐四年(1052年),包拯任登州通判;宋徽宗政和五年(1115年),宗泽亦任登州通判。二人先后宦游海疆,莅任施政,虽在登州的时日有限,却以清廉仁政、忠烈风骨植根乡土、留迹山海,为古登州文脉平添了厚重的荣光。

包拯字希仁,庐州合肥人,北宋咸平二年(999年)生。自幼勤学砥行,天圣五年(1027年)登进士第。历官大理评事、地方县令,后迁天章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,后世故称包待制、包龙图。

其生性端严持重,立身不苟,史载不苟言笑,民间有“笑比黄河清”之喻。平生不曲意逢迎,不伤辞色以悦权贵;居官恪守清规,严于律已,生活简约淡泊,虽位列高官,仍奉己俭约一如布衣,为后世清官廉吏之典范。

皇祐四年七月,包拯受命莅任登州通判。宋代通判为州郡副贰,佐理庶政、参决刑狱,监察僚属,位卑而任重。登州地处胶东海隅,扼渤海门户,为海防要地、海陆通衢,民生吏治关系一方安谧。

包拯莅任之后,秉持刚正本色,体恤间间疾苦,秉公治事,不徇私情;严整官衙风纪,约束豪强兼并,敦化乡俗,安定民生。《登州府志》与正史仅存仕宦履历,未详载细碎案牍事迹,然其清正之名、刚直之节,早已浸润乡邦,口碑世代相传。

包拯家风谨肃,修身齐家垂范后人。其子包绶、孙包永年,皆承祖训,居官清正,克守廉声,一门清德,流芳后世。

宗泽字汝霖,婺州义乌人,两宋之交杰出政治家、军事家,赤诚报国,气节凛然,为一代抗金民族英雄。

宗泽少怀大志,器识宏远,勤学笃修。元祐六年(1091年)进士及第,自此步入仕途。初授馆陶县尉,历掖县知县,政和五年(1115年)调任登州通判。

其时,登州辖境内有官田数百顷,皆荒蕪不毛之地,无农耕收益,官府却常年定额征缴赋税万余缗,层层摊派于民,百姓疲于苛敛,生计维艰。宗泽莅任之后,深入乡野,察访民情,据实核勘田赋利弊,随即上疏朝廷,据实陈情,恳请蠲免荒田虚税,为登州百姓卸去无端重负,体恤民艰,惠及闾里。

宗泽一生为官,皆以爱民恤民、持正敢为为本。主政掖县时,朝廷下旨征购牛黄,民间需宰杀耕牛以供征集。耕牛为农家衣食根本,滥杀则伤及民生根基。宗泽据理直陈,以时无牛交、无从结牛黄为由婉拒征取,并挺身独担责任,据实上奏,保全一方农本生计。

早年宗泽任馆陶县尉时,适逢黄河防汛急务,公文猝至,恰逢长子新丧,私哀在身,仍以公务为先,即刻赴任巡堤,时人赞其公而忘家。朝廷曾拟隆冬疏浚御河,役夫寒冻困顿,民力不堪。宗泽体察时艰,上书力陈寒冬兴役劳民伤财,建议开春农闲再行施工,事半功倍,其建言终被朝廷采纳。

靖康之变后,建炎元年(1127年),宗泽出任东京留守、知开封府。招纳各路忠义义军,联络两河豪杰,举荐岳飞等良将委以兵任,整伤防务,屡挫金兵。金人惮其威望气节,敬畏有加,私下尊称他“宗爷爷”。

宗泽心系中原故土,志在匡复河山,前后二十余次上疏



包拯画像

高宗,力请还都东京,筹谋北伐收复大计,然终不被采纳。壮志难伸,忧愤成疾,临终犹以恢复中原为念,连呼三声过河而逝。遗疏拳拳,仍以还都固本、重振朝纲为请,忠肝义胆,昭垂青史。

岁月流转,州邑更迭,昔日登州官署旧址虽已湮于尘烟,然光绪《增修登州府志》史笔留痕,简记二人仕宦履历,字字皆为信史。

包拯以清立身,砥砺吏治清风;宗泽以忠许国,常怀爱民本心。两位大宋名臣,相隔数十年,先后驻足登州,履职海疆,使蓬莱这片山海胜地,既有仙阁海市之胜景,更有名臣宦宦之风骨。

一卷方志存往事,一方山海留贤名。包拯、宗泽宦迹登州这段文史往事,理应被乡土铭记,被后人知晓,永续先贤清正爱民、忠义担当之精神文脉。

又见福山

□于全华

广场上立着一座木塔。不是古塔,是简易的木制塔楼,漆成赭色,两层,四角飞檐。塔身不高,站在下面能看清每一块木板的拼接纹路。塔顶挂着一块匾,上写“又见福山”四个大字。

我站住。“又见”两个字,像一把钥匙。不是打开了什么,而是提醒我——你已经来过,但你还得再来;你已经看过,但你还得再看。

福山,不是一次能看完的。

一

第一次“见”,在青龙山。那天是“五一”劳动节。我沿着石阶往上走,脚下是红军长征的纪年表:1927、1934、1935、1949……每一级台阶,都是一个年份。我踩上去,像踩进时间的脉搏一样。

石阶两边,松枝和海棠枝伸出来,盖住了一排石刻。我腿酸坐下,偏头,伸手拂开落叶——王燕缙、王权熙、余崇光……福山的进士、福山的先贤,从石刻里浮出来,像刚刚睡醒。

我用手指描那个“缙”字。石头湿湿的、凉凉的,不掉粉,是那种被风雨洗干净了的感觉。

那一刻我明白了:福山不在高处,它在脚下,在手指拂过落叶时的沙沙声里。

二

第二次“见”,在夹河边的灰墙上。那座小房子,常年锁着。我路过无数次,从未多看一眼。直到有一天,我绕到它的背面——临河那一面——才发现墙上嵌满了铜雕。

阴阳书院、县衙旧址、大成棧、红卍字会、夹河渡口……福山的文、政、商、善、行,像被一只无形的手,按进了这面墙的肌理里。

锁住的是门,锁不住的是一整部福山近代史。我摸着铜雕上的门廊线条,冰凉的,但百年前的算盘声、称量银元的叮当声、伙计搬货的吆喝声,从铜壁里渗出来,与夹河的水声混在一起。

那一刻我明白了:福山不在正面,它在背面,在被忽略的、背对行人的那一面。

三

第三次“见”,是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面。面向王懿荣广场和青龙山的那堵墙上,嵌着福山的历代

奥图。从明万历到清光绪,从城池布局到全县地舆,城墙的垛口、庙宇的飞檐、街巷的网格,都在墙上蛰伏着。

我沿着墙走,从清末的行政区划图出发,一路逆着时间,走回明万历的“四街八巷”。几幅铜刻,像几张被摊开的底片,显露出福山六百年的叠影。那一刻我明白了:福山不在现在,它在纸上,在奥图的线条里,在被时间啃噬过的沟壑里。

四

第四次“见”,就是今天。我又来到那座小房子前。这次我看得更仔细:青色瓦房,很小,像一座普通的民居,但四周被黄色围墙全部围起来,严严实实。临夹河那面是铜墙,面向王懿荣广场的那面是奥图。另外两面,是光秃秃的黄土墙,种着高高的绿化带,无法靠近,看不见里面是什么。

我绕着它走了一圈。铜雕的那面我看懂了,奥图的那面我也看懂了,但黄土墙的那两面,我什么也看不见。第一次,“见”到了。第二次,“见”到了。第三次,“见”到了。第四次,只见到墙。我在木塔下站了很久。

“又见福山”——这个“又”,是承诺。承诺我会再来,再来,再来,来看看没看见的部分。

我坐在广场的石凳上,掏出笔记本,写下这句话:福山,不是一次能看完的。看完了,就不是福山了。远处,青龙山静卧,夹河水无声流淌。王懿荣纪念馆的灰瓦顶,在树缝里露出一个角。广场上有人在放风筝,风筝线很长,几乎看不见尽头。

我忽然想,“又见”两个字,合起来看,就是“观”。观福山,不是一眼看尽,是看一遍,再看一遍。每一次“又见”,都比上一次多看见一层。这层是石阶上的名字,那层是铜墙上的商榷,再一层是黄土墙围起来的、看不见的、但你知道它在那里的——秘密。

福山这个名字,本身就是一个祝福。“福”是福祉,“山”是安稳。福山,就是一片安稳的福祉。我不知道墙里面是什么。也许是一座古宅,也许是一口古井,也许只是一块空地。但我知道,它被黄土墙围起来,不是为了拒绝,而是为了等待——等待一个愿意绕着它走一圈、愿意在木塔下站很久、愿意把“又见”当成承诺的人。

我站起来,准备离开。走了几步,又回头看了一眼。木塔还在,匾额还在,“又见福山”四个字还在。夕阳照在黄土墙上,把墙面染成赭红色,像一块巨大的、还没被写字的宣纸。

下一次“又见”,我会看见什么?我不知道,但我会来。